

目 录

马叙伦先生事略 寿墨卿 (1)

老报人王芸生 王芝芙 (51)

——回忆我的父亲

《大公报》与胡政之 曹世瑛 (91)

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述要 朱仲华 陈于德 (129)

忆老校长李登辉先生 章 益 (150)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章元善 尚传道 (158)

周诒春和贵阳清华中学 王思立 宋兰英 唐宝心 (172)

女师大的沿革 华 林 (190)

一个职业歌舞团的诞生 魏紫波 (197)

北京人艺——我国早期的私立话剧学校 刘味根 (207)

粤剧的戏班和戏院 刘国兴 (217)

补充 订正 质疑

黄爱、范天轮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谌小岑 (257)

对第六十四辑《孙殿英投敌经过》

一文的订正 郑桓武 (259)

马叙伦先生事略

寿墨卿

马叙伦先生字彝初，改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从尽忠报国到参加民主革命

马老的高祖是农民，曾祖是鞋匠，开个小鞋铺。祖父三考出身，取得了正路功名，做过京官。父亲继承书香，写得一手好字，但一生坎坷，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他五岁那年，父亲就给他延师破蒙，期望殷切，督教极严。十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可是母亲偏要他继续念书，并嘱咐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爸爸争争气。”从此，这位贤母加倍辛劳，以十指所得，供他一人读书。他不负慈母期望，学习勤奋，过目成诵。但因并不明白书中的真正意义，对读书的兴趣不高。十一岁那年，他跟父亲生前好友汤颐琐先生到苏州读书。汤先生当时在温州就馆，不能亲自教他。教他的老师叫刘题，循循善诱，讲解清楚，使他懂得《论语》、《孟子》等书上

的微言大义。他茅塞顿开，兴趣倍增，开始体味到读书的乐趣了。

不久，他又跟着汤夫人去温州就读，由汤先生教他读《诗经》、

《尚书》等古代诗文。十三岁那年，他回到杭州，先后进宗文义塾和范文成老师的私塾读书，学做试帖诗和八股文，但没有学好。十四岁那年，碰上戊戌变法，杭州有了新式学堂。翌年夏，他进养正书塾读书。

养正是一个比较新式的书塾，设有国文、历史、掌故、地理、数学、英语等课。对于地理、数学、英语等课，他总是格格不入，学不进去；但对于国文、历史、掌故等课，他则得心应手，在学习成绩上总是名列前茅。星期考试，一连考上七次第一。半年之内，连升两班。一年以后就升为特班生。当时他想：自己“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①成为历史名人。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革命思潮打消了。

一九〇〇年爆发了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挟着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城。一天，他从陈介石老师那里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好象天从头上压下来了”，不禁嚎啕大哭。这位老师却不声不响，等到他实在哭得太伤心了，才慈祥地对他说：“不要哭了，你回去吧，我慢慢地给你讲明白。”翰林出身的陈老师，是他平时所尊敬的历史学家。听了陈老师的话，他认为此中自有道理，就呜咽着回去了。

陈老师教书，善于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照孔老夫子的说法，叫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那天以后，并没有找他谈话，

① 引自马叙伦先生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该书。

只是在上历史课时给学生讲些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换代的历史。听了这些，他心里似乎亮堂多了。接着，陈老师又介绍他阅读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及《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禁书。得到这些书以后，他夜以继日地贪婪地阅读着。

《黄书》宣传反清学说，认为异族入侵，“是生民以来未有之祸”。《明夷待访录》的作者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都是清军入关时在两地屠杀淫掠的实录。这些论著和史实，激起了他的义愤，打消了“尽忠报国”的糊涂思想。

接着陈老师又指点他阅读一些西欧进步书刊的译著，最先读到的是严复翻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当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时，他感到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极为新鲜的境界。

他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法意》的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其后，他又读了法国卢梭的《民约论》。这本书阐述了天赋人权和平等自由的理论。论证了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的观点，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他好象发现了新大陆，寻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清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了。他开始找志同道合的革命者。

在同学里，他把特班生里的汤尔和、杜士珍引为同志，并拜了把子。他们三人开始做组织同学的工作。

他们担任了各班生的教师，指导小同学们读书。他们向总理（校长）上书，要求开设体操课，增加体育设备，活跃体育生活。

他们用个人得到的奖学金购置书报，办起了一个小藏书楼，叫做“皆大欢喜藏书楼”，给同学们提供了阅览场所。

他们还组织各种时事演讲会、新知识辩论会，开展各种社交活动。

一九〇一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他和汤、杜两人将于翌年暑假毕业。校方已内定派他们三人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他们也互相约定赴日本学陆军，以便学成后干革命。可是就在毕业前两个月，学校里发生一次学潮，把他和杜士珍卷进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学校里有一位学正，官儿不大，平时威风却不小，早为同学们所侧目。一天晚上，有三位同学和学正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本来就不把学正放在眼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学正向他们怒目而视，他们却装作没看见，继续高声谈笑。这一来，学正发脾气了：“‘食不语，寝不言’夫子之道也。你们懂得吗？”

“我们不懂。嘻，嘻！”

于是学正拍案而起，盛怒而去。同学们都替这三个人担忧。果然，没过多久，校里的监督（养正改为学堂后的校长）坐着四人大轿，冲进校门，立即在“君子堂”里召集全校师生，要把三个肇事学生宣布开除出校。

他和几位特班生急了，立即邀请总教习陈介石来挽救，陈老师毫不推辞，一口气跑进办公室。监督拿起朱笔正要写开除布告，陈老师迫不及待地嚷道：“不能！不能！”

“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毋得干预！”

“那末我也辞职好了！”

听说总教习辞职，满堂学生都轰动了：“陈老师辞职了，我们都走！”

同学们说到做到，一面凑出钱来租房子，作为暂时安身之所，同时推几位特班生写呈文向三大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控诉。第二天清早，大家向孔夫子牌位行个礼，就陆续离开学校，以示决绝。事情闹大了，校方就用分化手法，稳住了大部分学生继续上学。校里六个特班生，除汤尔和因病未参加学潮外，都因带头闹事，被开除出校。

被开除出校以后，赴日留学的计划落空了。为了生活，他跑到上海从事报刊编辑工作。

那时，上海是维新和革命两种思潮集中角逐的场所，各种刊物蓬勃兴起。他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他先后帮蒋观云编辑《选报》，帮赵祖德办《新世界学报》，任主编。后来，他又和黄晦闻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陈佩忍、刘师培等人写文章。这个刊物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想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出版以后，居然风行一时。在革命思潮的不断陶冶中，他提高了思想意识，更坚定了革命斗志。

一次他在西湖游艇里高声唱道：“一击满湖（谐“满胡”音）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二十岁结婚时，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新房门口。上联是“颍桴独立鼓”，下联是“我揭自由旗”。豪情壮志，放言无忌。

结婚以后，他在杭州、江山、诸暨等地做了两年教员，传播革命思想。一九〇六年下半年，他应陈介石老师之邀，到广州两

广师范馆和方言学堂先后教书。方言学堂学生有许多是同盟会的会员，他和学生之间，不仅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他当时以“戎马书生”自励。课余之暇，就练习武术、骑术。不久，他居然可以不用控缰踩镫，放手让骏马飞奔了。

一九〇八年，清廷颁布咨议局章程。次年九月，各省咨议局开会，陈介石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长。他应陈老师之邀，辞去方言学堂教职，回杭州工作。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课，在《浙江日报》担任社论主笔，还在咨议局兼了一个职务。通过教学和报纸，传播革命思想，鼓吹民族和民权主义，反对清廷统治和君主政体。一九一〇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陈佩忍、高旭等发起的南社。南社主张通过文字著作，“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一九一一年夏季，他专程去日本会见章太炎，商讨革命策略。经章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回杭以后，立即投入江浙两省民众为保卫沪杭甬铁路的权益而掀起的爱国护路运动。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发难。他立即商得陈介石议长的同意，由咨议局邀请杭州商会和各界绅士共同发起组织民团，成立民团局，推汤寿潜、陈介石分任总、副理。表面是维护治安，实际是准备响应起义。他和汤尔和、楼守光三人分别担任城区巡防，并联络驻军，准备发动起义。

到了阴历九月十三日夜，标统周承蒺部起义成功，包围了巡抚衙门，活捉巡抚增韞。第二天大早，他到咨议局商量善后，决定由陈介石、沈钧儒、褚辅成和他四人署名，电邀汤寿潜来杭就都督职，接着就组成都督府，由褚辅成任民政司长，沈钧儒任教

育司长，张鸿任财政司长，他被任为都督府秘书。

反对袁世凯帝制

辛亥革命，全国光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当时，马老的想法是：参加革命，推翻清廷，是自己“不能辞卸的责任”；“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分让学有专长的人去做。”他认为自己的本行是教书，“本来不晓得政治，还是做教书匠，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吧。”他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加上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易》辞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击壤歌》，“就想做一个高人逸士，也想做个侠客。”

此外，在做学生的时候，他从陈介石老师那里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概念，后来又读了《托尔斯泰传记》，因而又搀杂了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下决心：“不问一切，只做教书匠。”

他在汤寿潜的都督府担任了几个月的秘书以后，就辞职到上海帮章太炎主编《大共和日报》去了。

他和章太炎“谊在师友之间”。当时，他帮章太炎在杭州办过一个什么联合会的分会，但他自己没有参加进去。陈介石老师是统一党党员，他和陈老师有深厚的师生情谊，还替陈老师帮过忙，可是他没有参加统一党。他有很多师友是进步党人，但他没有踏入进步党的门槛。照他自己的说法，叫做“超然物外”。

一九一二年，浙江省都督改由蒋簋尊署理。应蒋的邀约，他

再一次担任了都督府的秘书。但是几个月以后，他仍然辞去职务，回到浙江第一师范教书去了。照他自己的说法，叫做“还我初服”。

一九一二年，他担任北京医药专门学校的国文教员。当时，他专心教书，“真是什么事也不问”。每天晚上，找几个朋友聊天，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朋友中有个邵裴子，美国留学生，当时担任财政部主事。这人是金石书画的鉴赏家，而且对书法有精辟的研究。马老和他切磋琢磨，深受其益。闲谈“风雅”，生活十分舒适。

可是好景不长。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把银行现金都挪用到军事上去了，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现，钞票价值跌到对折以下，公教人员叫苦连天，“风雅之谈，就此搁起”。

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应邀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兼课。那时，袁氏复辟帝制的步伐，着着推进，为了牢笼人心，削除异己，袁氏对一些人封官晋爵，对另一些人则进行监视甚至监禁。被袁氏任为经界局总裁的蔡锷，是被严密监视的一个。这蔡锷表面佯示拥护帝制，却趁袁氏监视稍疏的时候，一溜烟逃出北京，驰往云南起兵讨袁去了。

公开反对帝制的章太炎，也是被袁氏监禁的一个。监禁的地点，最初是在龙泉寺。章氏以绝食相对抗。马老知道后，即邀同黄晦闻分别写信给李经羲，请李向袁氏进行疏通，恢复章氏自由，马老信里称“太炎学通古今，名达中外，不特赤县为冠冕，亦宇内之昆仑也”大约是袁氏怕章太炎绝食饿死，又把他移禁到城里钱粮胡同，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监视。马老通过人事关系经常去看他。没有多久，章太炎又开始第二次绝食了。马老用种

种譬解，劝他复食。他总是摇摇头说：“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

看来此路不通，马老又用别的话扯开。于是忽而谈孔孟，忽而谈老庄，忽而谈佛学，忽而谈理学，三教九流，无所不谈。一谈就是大半天。章氏谈兴正浓，看来绝食决心已见活动，马老肚里也咕噜咕噜地叫了，于是马老乘机再度劝食。

马老说：“我还没吃饭，肚子饿了，让我回去吃饭吧！”

章摆摆手，叫马老不要走：“吃饭容易，我这里有厨司，替你做一点就是。”

马老苦笑着说：“我也知道你这里有厨司，但面对一个绝食的朋友，据案大嚼，情何以堪？”章想了一会说：“那我陪你吃一点就是。”

马老非常高兴地陪他吃了两碗鸡子儿，从而章氏戏剧性地结束了绝食，此后，马老不断地去安慰他，商量讨袁计划。同时，通过参政马其昶的关系，向吴炳湘打通关节，对他放松了警卫。

这年寒假将近，袁氏已经择定“吉日”，准备黄袍加身了。不愿“在袁皇帝辇毂之下混事”的马老，以绝大的决心辞去了北大和医专两处教职，离京南下。他和章太炎依依惜别。他在诗中写道：“别情无语更凄然，不堪回首是离筵。”

为了倒袁，章太炎叫马老去找张謇商量。考虑到张是“嵩山四友”^①之一，而且平日和自己很少交往，所以马老没有去找，却找了一位总统府顾问廖容商量。

这廖容是马老在广州方言学堂教书时的学生，洪门中人，曾

① 袁世凯曾把徐世昌、张謇、李经羲、赵尔巽四人封为“嵩山四友”并下令褒扬。

在惠州担任过军职。当时马老和廖容有一段对话：

马：“袁世凯要做皇帝了，你怎么办？”

廖：“辞了职回广东。”

马：“光是回广东？”

廖：“老师想怎么办？”

马：“你从前的旧部还在嘛，不能起兵讨逆？”

廖：“可以的！”

马：“你回去就能召集吗？”

廖：“只要三天就召集了。”

马：“这么容易？”

廖：“我回去后，往各人家里送一张名片，不要三天，我回家的消息就传遍了。他们自会来找我的。”

马：“事不宜迟，就这么办，我回上海等候消息。”

马老回到上海不久，就得到廖容从广东来信，说是事情已经布置妥当，只差一篇檄文。马老立即用骅体写了讨袁檄文寄给廖容，刊登在香港报纸上。接着廖容纠集了七营士兵，随同护国军讨逆。

参加“五四”运动，领导“索薪”斗争

在推翻袁氏帝制以后，马老在浙江财政厅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秘书工作。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应邀再回北大任教，“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据他自己解释，这有几种原因：一则，他认为自己不懂政治，也缺乏办事才能；二则，他决心要写完《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当时兴趣正浓，不想分

心；三则，他在北大讲老庄哲学，“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相象了，便要参考一下佛学，所以没有时间去过问别事了。”

可是，平地一声雷，在他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在他平静的思潮里就涌起了不平静的波澜。

运动一天天地在发展。到了六月三日，学生出动了上千人上街演讲，竟遭徐世昌下令逮捕。一连两天，被捕学生达一千多人，拘禁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

为了推进运动，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学生都成立学生会，各校教职员也成立了教职员会。马老被推为北大教职员会书记，以后又担任了主席。接着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马老又被推为书记、主席。他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发表谈话和文章，慰问被捕学生，并向政府提出交涉和要求。在运动高潮的时候，每天从早八点至晚六点，有时直到八点以后，他总是在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的教员休息室办公，保持同各方面的联系。

五四运动很快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由于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北京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罢免三个卖国贼而告胜利结束。

马老后来说：“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造成了一个时代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应该说，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时代意识，而且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增长了办事才能。以后他担任了北大评议会委员，并继续主持北大教职员会、北京八大学教职员会联合会和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所有对外披露的文字，大都出

自他的手笔。

当时，军阀割据，内战频繁，民穷财尽，北京各校教育经费大量拖欠，公教人员生活无着，政府视若无睹。马老以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的身份，代表教职员对军阀政府进行了多次的索薪斗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北京小学以上全部公立学校为索薪而举行了罢课斗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又举行了第二次索薪斗争。经过激烈斗争，政府只发清一部分欠薪，拖拖拉拉，敷衍了事。到了一九三一年三月，国立大专以上八校的欠薪，已经累积达三个半月之多。马老代表八校教职员向政府交涉多次，也没有结果。迫不得已，各校教职员代表决定从三月十四日起暂行停止职务。推定马叙伦、陈世璋、姚憾三人赴府院请愿，并发表宣言。

但在军阀政府眼里，什么停职，什么罢课，什么请愿，全不放在心上。各校教职员代表于四月七日再次集会，决定全体教职员向八校校长提出总辞职，辞职宣言说：

“两三年来，政府不肯设法维持教育，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已经受了很多的痛苦，所以不肯决然舍去的缘故，一则不忍抛开纯洁的青年学子，二则不愿离开多年的教育职业。委曲求全，希望政府拿出点良心来维持教育。到了今日，真是山穷水尽。只有辞职一条路了！现在于四月八日全体辞职。”接着，教育总长范源濂和国立八校校长蒋梦麟等也相继辞职。北京教育界一片混乱。

四月十三日，八校学生游行示威，当局置之不理。二十一日，靳云鹏主持内阁，对积欠教育经费作出了分期清付的决定。八校教联会以经费解决有希望，宣布于五月一日起复职。

谁也没有料到，这只是靳内阁玩弄的欺骗手段。四月份过去了，经费没有拨下来！五月十日，徐世昌邀集军阀曹锟、张作

霖、王占元三人和靳内阁在总统府开会，商议财政分配办法。靳内阁满足了军阀们的要求。教育经费却依然分文无着。八校教职员又一次失望了。

紧接着，八校校长于五月十三日谒靳内阁于私邸，靳待之以闭门羹。十六日，又赴国务院求见，被卫兵所阻。无权无勇的八校校长只好再一次愤而辞职。八校校长的辞职，给国务院以倒打一耙的借口。十九日，国务院发表给教育部的公函，说什么：“八校迄未开课，教职员薪水暂行停发。”把停发教育经费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八校教职员被逼走上了绝路。八校教联会于廿一日、廿二日连续开会，由马老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发表《告国人书》，宣布政府摧残教育罪状：

“十载以来，祸乱迭起，政象日就混乱，强藩争为攘据，中国统一之局，久已荡然无存矣！”书中接着指出，在国家分崩离析之中，用以维系民族统一精神的只有教育事业。“今政府不惟不思设法以维持之，而反摧残之，破坏之，惟恐其不速，此殆民族精神灭亡之征，而尸其咎者，实惟今日之政府也。”《告国人书》最后说，八校教职员今后志愿是自办教育，如不能自办，即全体南下。“士可杀，不可辱”。

从这一天起，八校教联会天天派代表向教育部索债。催索无效，教联会决定找总统徐世昌直接说话。那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的早晨，八校教职员、公立中小学教职员和各校学生约万人，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要求马邻翼代部长率领全体请愿师生赴总统府请愿。不料这军阀头子却在新华门前布置了大批军警。等到请愿队伍到达门前，即下令军警挺枪冲击。走在队伍前头的马老、李

大钊、沈士远等均受重伤，被送进首善医院救治。进院以后，政府就派警探对马老严密监视，不准见人。同时还对马老提起公诉，说什么：马邻翼代部长及总统府卫兵被马叙伦等打伤。一派胡言，更引起教育界的公愤。

六·三事件发生以后，国内教育界积极声援，国际舆论也把军阀政府的暴行斥之为野蛮的，没有人性的行为。孙中山先生从广州发表声明，对北京军阀政府进行严厉的谴责。为了缓和舆论，政府于六月十五日拨发了一部分欠薪。以后经过范源濂、汪大燮、张一磨、张国淦、傅增湘等五人出任调解，商定了今后教育经费的拨付办法。各校教职员宣告乃于七月二十八日复职。马老于出院后抱病担任八校教职员代表，为教育经费继续与政府交涉折冲。但无视教育事业的北洋政府，一再违反约定，教育经费仍然一再拖欠，无法彻底解决。八月二十日，马老曾在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上提出了维持八校办法三条：

- （一）完全由八校教职员自身出来维持；
- （二）邀请社会上有声望而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出来维持；
- （三）万一不能维持八校全部时，组织一个财产监护委员会负责监护八校财产。

虽然原案得到通过，却没有付诸实施。马老因在“六三”事件中头部受伤过重，时时作痛，医治数月，迄未奏效，因而不得不脱离职务，请假回杭州休养。

北伐战争前后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那时马老在北大任教，积极拥护联俄联共政策。

一月二十三日，列宁逝世，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青年俱乐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四团体，于二十六日在北大三院举行列宁遥祭大会，由马老致悼词。他说：列宁为全世界劳动领袖、全世界革命的首领、全世界弱小民族的提携者、马克思学说的大师。当此世界劳动主义萌芽时代，遽丧此明星，不但俄国民族失此中流砥柱，全世界民族均失所遵循。

可是，北洋政府仇视列宁缔造的苏俄，不予承认。马老联合北大四十七位教授于二月十五日致函顾维钧、王正廷，敦促政府立即恢复中俄邦交。接着马老又联合北京六团体（青年国民俱乐部、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合会、北京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二月二十七日致函王正廷，促其即日无条件承认苏俄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才同意与苏俄互派大使，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同年八月二日，在北京八大学教职员为中俄复交后第一任苏联驻我国大使加拉罕举行的欢迎会上，马老代表八大学教职员发表了长篇的欢迎词。

马老说：“我国与各国通聘以来，互派大使，此番实为新纪元。”“正以今日之苏俄，乃推倒帝国主义之前驱，为人类谋解放，实现真正平等幸福之先导。”

马老说：“俄国与中国俱为远东新造之民主国，又有历史上地理上的关系，一经携手，中俄两国之前途自然相互的共进于光明；即远东之和平与光明，亦惟中俄两国能担任之。推而至于世界之和平与光明，亦复以此为基础。”

同年十月，第二次奉直战争爆发。十一月，贿选总统曹锟被迫下台。段祺瑞上台执政。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由于孙段合作，有了一定的默契，国民党员就在北京公开露面。马老当时担任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

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孙先生抱病进京，马老到车站迎候，不料到京以后，病情恶化。三月十二日，一代伟人终于与世长辞。马老参加陪灵，哀悼不已。

那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马老闻讯，立即邀集国民党人组成了“五卅惨案后援会”，自任主席职务。他联合其他爱国团体组织游行示威，开展宣传活动，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怒涛。马老还亲自策动英国驻华使馆全部华籍职工进行罢工斗争。

同年七月十八日，北京五百余团体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马老担任大会总指挥。大会通过了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接管上海公共租界及各地英租界等决议，并推举李石曾、易培基、马叙伦等二十余人作为执行委员，通电全国人民督促政府执行。会后，马老与易培基等带同大会决议赴执政府谒段，段拒绝接见。

那时孙段合作早成泡影。段政府越来越敌视国民党。在北京的国民党人也越来越不满段执政。到了十一月底，北京学生、工人和市民数万人，接连两天先后在神武门和天安门召开了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大会由北大教授朱家骅主持，马老参加了主席团。大会提出了“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的口号。会后示威游行，捣毁了段祺瑞部下要人住宅几处。